

##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第 483 期

13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20年3月4日

## 大疫读书记

■冯天瑜



己亥末、庚子初,新冠肺炎肆虐吾市、吾省,又播及全国乃至域外,一场罕见的生态危机降临。武汉封城月余,老朽如吾者,无力无能投身抗疫实战,禁足在宅,惟思虑、读书为务。而身历时艰,读书别有体悟,今择先贤书语(列书名、篇名)并略附浅议如次,供同在封城的诸君参览。

## “中国的脊梁”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934年,鲁迅感于社会危难之际,有些人一味指责国人丧失自信力。鲁迅反诘:“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他援引古今实证后曰:“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以本次抗疫为例,我们的白衣战士迎难而上,向社会预警疫情,可谓“捨身求法”;本市和来自全国各省市及部队的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奋不顾身,抢救患者,诚然“为民请命”,挽狂澜于既倒。而农民工、社会捐助者、义工、志愿者蜂起云涌,以布衣之身,尽天下之责,他们正是撑持中国坚挺的脊梁。

鲁迅说得深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诬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月24日晚,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福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说:“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份情。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

## “上医医国”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医生治病救人,乃高尚职业。而古贤以为,医者使命尚不止此,唐代药王孙思邈有金句云:“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此语原出晚周典籍《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医人。’”认为最上等的医生为国除患祛弊,其次是疗疾、医人。近代有力行此卓论者——孙中山、鲁迅皆学医出身,而毕生尽力于疗治国家弊端,诚“上医”也。今次疫情初现,有司顾虑稳定,限抑信息传播,而有医者犯难而行,向民间报告疫情,以引起社会警觉,此为“医国”之举,堪称“上医”。吾辈礼敬医人疗疾之大夫,尤敬医国除弊之上医。

张继先、李文亮等医生早期发现新冠肺炎传染,即时向社会报告,便属“医国”之举;在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8日两批专家组称没有“人传人”,疫情“可控可防”之际,卢钟南山院士1月18日来汉考查,宣布已经“人传人”,疫情严重,应立即封城,亦为“医国”之举。“上医医国”乃仁心侠行,堪为世范。

## 商贾救亡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淮南子·人间训》《抗日战争史》《抗日战争大辞典》

吾国有“重本抑末”传统,此“末”指商业、商人,四民排列秩序“士农工商”,商贾屈居末座,在雅俗两层面往往不受待见。这其实是有失公道的。我们暂且按下商业、商人重要的、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不表,即以历史上商人的卓异表现而论,便令人肃然起敬,衷心礼赞。

春秋末,秦军欲偷袭郑国,正在周地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恰逢秦军,当即假借郑穆公之名,以十二头牛犒劳秦师,并派人返郑报信。弦高犒师之举,使秦将以为郑国知晓秦军偷袭计划,便立即班师,郑国免于灭国之祸。郑穆公欲重赏弦高,而弦高谢辞不见,自此隐于东夷,不复面世。

读抗日战争史,又见中国商人伟绩。

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大量

军工设备、大批军公教人员退集于长江三峡口的宜昌,民营航运巨擘卢作孚率民生公司数十艘轮船,不惜巨大牺牲,冒着日本飞机反复轰炸,将物资和人员运往四川。人称:卢作孚主持的宜昌大撤退为“东方敦刻尔克”。我以此一比拟,有道理而又须加修正。言其有理,是宜昌撤退与敦刻尔克撤退都是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著名的战略大撤退,成功地保存了中英两国反侵略的有生力量,东西两大撤退可谓并辉千秋。然而,称宜昌大撤退是“东方敦刻尔克”毕竟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言说,余以为,以历史实际而论,此一比拟的主体应为宜昌,当称敦刻尔克撤退为“欧洲的宜昌大撤退”。因为,宜昌撤退在1938年,敦刻尔克撤退在1940年,当然以前者为比拟主体。而且,就撤退人员、转运物资的数量和延续时间长度而言,宜昌撤退都在敦刻尔克撤退之上。卢作孚及民生公司已然彪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卢先生昭显了中国商人的崇高精神。

令人感奋的是,在时下的抗疫人民战争中,多方豪杰慷慨,各路人士竞力,而民营企业员工是其中的一支生力。我们以比较熟悉的武汉大学校友会中的企业家为例,便足显弦高、卢作孚后继有人。

## “封城”之际重览

## 先哲“生态前见”

余自1980年开始研习文化史,文化生态是40年来始终关注的要处。拙作《中华文化史》(1990)上篇专论此题,合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1999)、独撰《中国文化生成史》(2013)再作探讨,却皆言犹未尽,遂有近两年病中续写《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庚子岁首,出版社送来小书样稿,余修订之际,恰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武汉、湖北、全国乃至外域,令吾辈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平添切肤感受。

今次大疫的肇因正在研讨之中,是天然病毒还是人工合成病毒作祟,病毒的中间宿主是蝙蝠、穿山甲还是其他野生动物,尚无定论,但我们面对一场生态危机,则是朝野、

中外的共识。故从生态学角度反思大疫是必要的。

武汉1月23日“封城”前后的一个多月期间,余“宅”在家里,围绕生态问题,翻阅中外相关篇什,如《老子》《墨子》《周易》《孟子》《荀子》《周礼》《礼记》《正蒙》《西铭》及《瓦尔登湖》《地球祖国》《敬畏生命》《罗马俱乐部决断力》《只有一个地球》《转折点》等等,以之观照现实,心绪万端,集中到一点便是——生态是人类直面的紧迫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指涉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包含“天人”和“人文”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综汇而成的“文化生态”的历史演绎,正是定稿中的拙著所要探究的范畴。

“生态”的汉语本义,是生动意态,而现代所用“生态”一词是外来语,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19世纪60年代进化论者海克尔等创立生态学,探讨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20世纪中叶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又引伸为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人—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量关系作研究,这便是文化生态学。吾国使用近代义的“生态”一词不过百年,“生态学”研究更在晚近几十年间得以开展,但中华先贤很早就有关于人与环境密不可分、并有保护生态的践行,这些先民的“生态前见”,是传统文化蕴涵的宝贵财富,可供今人借鉴。

(一)“居楚而楚,居夏而夏”(《荀子·儒效》)一类环境决定人性的观点。

(二)“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系辞》),全方位审视生态环境的哲思。

(三)有珍惜自然资源的论说,如墨家谴责贵族“繁饰礼乐”,奢侈耗物,主张“节用”“节葬”(《墨子·节用》);道家“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反对暴殄天物;《资治通鉴》指出,资源有数,物品制造有大限,故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四)在社会管理层面,各朝设置虞、衡等环境保护机构,周代有山

虞、泽虞,川衡、林衡等职官,负责制定保护山林、河泽的法规,并巡视林麓,严禁滥砍滥伐。《淮南子》有休猎、休渔的详细记述。

(五)维护动植物可持续发展。《礼记》载“不斲天,不杀胎,不覆巢”(不抓小鸟,不杀孕兽,不倾覆鸟巢);又载“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王侯田猎时须网开一面,给野兽留余生路,以传后代。《国语》载,贤臣里革反对鲁宣公在春夏鸟兽孵卵怀孕时捕杀。《孟子》有“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名论。还有人建议渔网孔大,让幼小鱼者逃生,反对一网打尽、竭泽而渔。

要求人类放弃中心意识,是过高标准,而收敛侵占自然物欲望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是可行之路线,先民便有此睿智,值得今人学习。

有哲人更从形而上层面作生态议论。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参,则惑矣!”(《荀子·天论》)人们熟知荀子的“人定胜天”之说,但不要误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这种人事不违天地规律、顺应自然使用人力的思想,乃关于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远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此语中之“自然”,或解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合指本然如此。“自然”又解为名词,指物理性的大自然。而余以为,“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自然是宇宙的最高范畴,是宇宙本

身,此为千古卓绝之论。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旨。

如果把人类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对此当念兹在兹。

然而,吾辈所生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的三百年,“征服自然”衍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得到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体理性更趋发达,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自然辩证法》)如果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

地球上产生过千万物种,唯有人类,特别是创制核武器和生物工程技术的人类,已经具备毁灭地球上生灵(包括自身)的能力。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实确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毒,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行为。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而我们的生路是存在的,这便是——遵以自然法则,在社会活动中限抑物本倾向,复归人本精神和道法自然。理性的人类应当深怀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效法自然,善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视万物为友朋,引人类为同胞。此即宋人张载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执此之念,人类方有远大前程。张载《正蒙》云:“和则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 “如果科技在人身起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

■庄向阳

如果仅仅因为《技术垄断》([美]尼尔·波斯曼著,何道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一书写于20多年前,因为科学技术又有新的进步,就轻易否定这本书的思想价值,恐怕不能不说这样的评判太草率了。正如《消失的童年》《娱乐至死》畅销不衰,令人击节叫好一样,作为“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三的《技术垄断》也同样值得细品读。

从书的初版迄今,20多年过去了,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又取得了连串的进步和飞跃,互联网把人类社会连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信息加速流动,人工智能成为“显学”……种种变化更加印证了波斯曼当初的预言:人类在技术垄断的道路上以加速度前进,技术垄断的疆域不断扩大。因此,对于生活在今日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这本书不该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而应被我们反复阅读,该书字里行间,响着属于人文主义绵延的声音。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可以视为一部工具使用史。以工具的使用特点,或者说,以时代的技术特征为依据,波斯曼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以及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里,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最为漫长,直到17世纪,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属于工具使用文化阶段。17世纪,欧洲率先进入了技术统治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直至20世纪初,历时三个多世纪。而以1911年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面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技术垄断文化阶段。

所谓“技术垄断”,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在一个社会里,技术享有绝对统治地位,即“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58页)。既然是技术垄断,技术所波及的疆域当然不限于科学技术,而是入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医疗、社会科学研究、政治生活等诸多领域,技术无不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

要指出的是,技术的侵入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种侵入常常在自觉自愿中发生,没有质疑,有的是欢欣鼓舞。技术垄断为何具备这般魔力?技术仿如深夜舞会上充满蛊惑力的女子,没人能够拒绝与之共舞,更没有人虑及共舞之后会怎么样。而这正是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书中发出的深深的担忧:不否认技术拥有美好且强大的一面,但希望选择一种态度,确立一道底线来面对技术,这道底线就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不是为应对科技而出现。在欧洲中世纪末期,正是人文主义的兴起,打破了教会的垄断局面,人的力量得到尊崇,人的价值被发现,也正是从此时起,教会逐步放弃了对整个社会话语的垄断权。耐人寻味的是,上帝走下了神坛,科技却登上了“神坛”;科技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未来,代表了秩序,代表了美好……代表了一切。

从1911年至今已历100余年,人类寿命普遍增长,沟通更为快捷,旅行更为方便,甚至飞地球进入太空,用赫胥黎的一本书名来形容,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新世界”里。不可否认,这些都是拜技术进步所赐,但是,人类过得好吗?

不说的,单说信息吧。波斯曼认为,印刷术的普及,制造了一种全新的信息环境,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巨变,比如美国就是“用印刷文化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家”。今天,我们更是处在海量信息包围之中。过量的、超过人脑承载能力的信息,不仅推动了学科的细分、职业的细分、社会的细化,还使人患上了“抗信息缺损综合征”,一种文化的“艾滋病”。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个“躲猫猫的世界”。具而言之,就是不停地面对一个事件,又面对另一个事件,事件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人们精力耗尽,眼花缭乱,文化消散,社会无法凝聚。

对于波斯曼所说的“躲猫猫的世界”,还有什么比微信公众号上的热点作了更生动的诠释呢?前天我们无不为“湖南教师举报操场偷工减料后失踪16年”而激愤,昨天我们的关注点又转移到“千亿市值地产公司董事长涉嫌猥亵女童被抓”,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是干垃圾湿了”,到了明天,总会有新的热点值得我们投射自己的注意力。面对这些事件,我们频频阅读、点赞、评论、转发,但至于事件后续如何发展?关注的人却微乎其微了。

说到底,我们的眼睛从一个热点切换到另一个热点,频繁地转换信息目标,我们的神经总是处于兴奋状态,但是,这个世界却与我们没有更多更深的关联,没有因我们更多而更短暂的关注而变化,因为,我

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费信息。在这个“躲猫猫的世界”里,需要的其实是凝视,是持久的关注,需要把我们的热情、关切及思考长期地投注在周边的事物,以及影响深远的事物上,我们要学会理解事物的历史、背景及脉络,理解时还要怀着深切的同情。以上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且需要发自内心,而科技显然不能给予我们这些。

社会科学研究,其实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出现就开始打上科学的烙印。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等学科,纷纷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如此,就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轨,就落伍,就出局。

打开一本学术期刊,看到一篇以“确立健康目标有助于降低高热量食物消费”为主题的文章。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发现,但是也不乏上例这种“伪发现”“伪研究”混迹其间。在社会研究领域,通往真理的道路有很多条,科学的原则、方法怎能获得很多,科学的规范进行,所以就被视为学术研究,发表在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类似这样的文章有很多。

依循科学研究的规范,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也不乏上例这种“伪发现”“伪研究”混迹其间。在社会研究领域,通往真理的道路有很多条,科学的规范进行,所以就被视为学术研究,发表在高级别的学术刊物上。类似这样的文章有很多。

常常是模式化的、干巴的。波斯曼指出,社会研究的种种成果作为人类思想的凝结形式,“魅力来自于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

《技术垄断》一书写作时,代表当今世界科技水平的诸多事物及名词还未出现,比如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等,当然还有智能手机这样人人必备的工具。尽管如此,波斯曼也已敏锐地指出了人类面临的难题和困境,难题之一是波斯曼所称的“机器意识形态”。

当人们用“计算机显示”这样的话为一段数据开头时,经由计算机处理过的数据就获得了一种先人的正确性,仿佛“此乃神意”的翻版,没有意识的计算机从而被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这正是技术垄断地位的标示。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来自计算机的数据,甚至忽略了:数据从何而来?谁对数据进行加工?谁从这些数据中受益?

波斯曼注意到,计算机与官僚主义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官僚主义者最喜欢计算机,因为计算机能为官僚主义者带来权威。

谷歌、苹果、脸书及国内的百度,不操掌着亿万人的心灵和隐私?有一个流行词叫做“算法”,根据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轨迹精确地为用户画像,向其投放信息,当然少不了广告和各种消费类信息。一切貌似为用户着想,殊不知所有的“算法”只能定格过去,而无法指向未来,所以这种画像也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科技最新的前沿领域,可能也

是人类面临的最后和最大的威胁,就是人工智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物理学家霍金提出了著名的“十问”,其中第九个问题便是:“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过我们?”霍金提出了这个问题,试着做了回答,但是他的回答里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他的担心就是他的答案,技术永远是傲慢的,稍一疏忽,谁知道人类最后会陷于怎样的境地呢?霍金可能已经意识到,人类面临的难题与几十年前并无二致,人类仍然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这位知名物理学家生命的最后,他其实是回到了人文主义者出发的地方。

何谓人文主义?法国思想家托多罗夫给出了人文主义的三根道德支柱:承认世界上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尊严;将其他所有人视为自己行为的终极目的;人们的所有行为都应出于自由选择,而非在外力的束缚下完成。人文主义并不反对科技本身,反对的只是科技不再是人类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了一种目的。

看看现实吧,在技术垄断的逻辑里,人非但不是终极目标,反而沦为追求人之上的某种目标的手段。这些目标包括效率、规模、生产、欲望等等,原本只是人类获得福祉的手段和工具,反而让人变成了工具。伊斯兰谩在16世纪曾大声疾呼:“如果上帝在人身起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那么人又有什么用?”是的,在21世纪,我们是否也可以轻声发问:“如果科技在人身起上起作用,就如同陶工对待黏土,那么人又有什么用?”不论这种声音如何微弱,都是发自主人文主义的悠长的声音。